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近代中国东北乡村 社会研究（1840—1931）

A Study on Society of Rural Community in
Modern Northeast China (1840-1931)

王广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近代中国东北乡村 社会研究（1840—1931）

A Study on Society of Rural Community in
Modern Northeast China (1840-1931)

王广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王广义

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1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0620-6

I. 近… II. 王… III. 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东北地区—1840~1931 IV. G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1638号

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

作 者:王广义 著

出 版 人:朱 庆

责任编辑:苑 琛

责任校对:邹皓丹 王帅一

特约编辑:王 康

责任印制: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945(发行),67078233(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690×975毫米 1/16

字数:341千字

印张:19

版次: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12-0620-6

定价:40.00元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近代东北乡村区位结构 / 13

第一节 东北地区乡村的自然环境 / 14

第二节 东北地区的人文环境 / 21

第三节 东北农村状况 / 27

第二章 近代东北乡村社区 / 38

第一节 村落社区 / 38

第二节 集镇社区 / 55

第三节 城乡关系 / 58

第三章 近代东北乡村的居民 / 63

第一节 乡村居民的社会分层 / 63

第二节 乡村居民的社会结构 / 68

第三节 乡村居民的社会流动 / 73

第四章 近代东北乡村家庭 / 80

第一节 乡村家庭 / 80

第二节 乡村家族 / 88



第三节 亲邻、同乡关系 / 92

第五章 乡村社会控制 / 96

第一节 全面职能的乡村行政 / 96

第二节 单一职能类型的保卫制度 / 118

第三节 其它的乡村社会控制方式 / 136

第六章 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化 / 150

第一节 交往生活方式 / 150

第二节 人生礼仪方式 / 153

第三节 岁时民俗与精神信仰 / 162

第四节 衣食住行生活方式演变 / 170

第五节 东北习俗与文化的特点 / 177

第七章 乡村社会经济状况 / 184

第一节 近代地权的演变 / 184

第二节 乡村生产关系 / 196

第三节 农业的商品化 / 228

第四节 农户收入与支出 / 235

第八章 乡村社会问题 / 243

第一节 教育问题 / 243

第二节 农业技术问题 / 250

第三节 社会治安问题 / 256

第四节 环境问题 / 261

结束语 / 265

参考文献 / 267

附录 / 284

后记 / 294



绪 论

一、选题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清末民初，中国东北地区的乡村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结构性变革。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出现了农业经济商品化，农村政权民主化，农民文化、生活多元化等诸多近代化趋向^①。这一趋向成为近代东北整个社会变迁的主旋律，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强势，而且因为乡村的经济结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整个东北社会历史的传统。可以说，20 世纪东北地区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独具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东北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因此，“近代东北乡村社会的变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从“长时段”、“全过程”探讨中国东北近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课题，而且也是认识当代中国“三农问题”、“振兴东北”等的重大课题最深层次的源头。

从现实意义上讲，三农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是国家发展亟待解决的矛盾。事实上，三农问题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对传统农业社会而言，三农问题素来被摆在首要的位置。“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是乡村社会问题的核心，本书重点是研究农村的政治控制、农民的社会生活、农业的经济发展，时间跨度从清朝直至民国。可以说，本书的研究是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整合，历史、现实问题的延续。但 20 世纪的中国乡村史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诸如乡村的区位结构（包括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① 关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内涵、外延、表征等内容学界争议很大，但大而言之，正如经济史专家吴承明所认为的那样：“近代化”与“现代化”这两个词几乎为同义词，在表达上有时可以互用，也无碍原义（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 16、17 世纪的现代化因素》，《吴承明集》，2002 年 12 月版，第 240 页）。本书采取这一趋同化的表述，更侧重于考察与“传统”不同的近代转型社会。



响)；乡村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体系的历史性变动(包括乡村职业结构、家庭、家族亲属和拟亲关系结构、阶级、阶层社会结构诸方面的变动)；乡村社会控制与文化网络的演变(包括乡村教化、乡村宗教与信仰、乡土意识、庙会等群体性活动的文化内涵)；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交通、通讯、文化教育事业对于乡村社会形成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对于乡村社会在区位结构和经济、文化结构中地位的影响；20世纪初的乡村危机和社会失序(包括农民贫困化、农民离村及社会流动，匪、赌、烟毒等社会问题和乡村权力痞化等)等等^①，而如今一些现实问题，很多都是这些历史问题的累积生成，或是沿着历史的路径依赖发展的结果。立足现实、勾沉历史、探究源头、解决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的意义所在。

从学术意义上讲，现有区域乡村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华北、江南、西北等地区，如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等。

虽然东北农业史、移民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大多也是从从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视角进行探讨，但是乡村社会历史整体研究，却尚无出现，所以本人研究旨趣也在于此，希望能够从社会史学的研究角度，给予新的阐释。中国乡村的区域差别甚大，发展极不平衡，东北与华北、华东等地域有着相当的差异，具有极大的开发潜能，东北地区有着极强的文化兼容和包容性，如何透过差异把握其共性特征，在充分吸收已有的乡村区域史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有助于全面阐明近现代中国乡村史发展的规律性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乡村史研究的主要学术诉求，而本书也愿意为此作出一些基础性的研究。

^① 王先明：《开展二十世纪的中国乡村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日。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最经典的研究范式是日本学者提出的“村落共同体”与美国这者施坚雅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范式。前者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平野义太郎,1944)后者认为中国农民生活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而是包括数个村庄在内的市场共同体。(施坚雅,1964)而中国近代东北乡村社会研究基本采取的是“村落共同体”研究范式。早在二十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橘朴、大上未广、山本义三等人的满洲研究都采取这一范式。他们认为:满洲的自然村落是家族性和宗法性的共同体,实行着共同的生活和自治。本书研究继续沿用这一模式。而本书研究的是,在经历了清初的封禁与清末的放垦,移民的大量涌入与土著少数民族的文化持守,日俄外来势力的侵略与东北人民的抗争等,既外放又内聚的多重、多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格局之中的近代东北乡村,其研究区域是独具的,研究内容更是复杂的。但对于近代中国东北乡村而言,基本没什么市场发育,还构不成市场共同体,乡村的生活范围仍局限于村落。村落(包括自然村落和行政村落两种,本书主要指行政村落)仍是我国农村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三农问题基本研究载体。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市镇、城市发展最初的雏形,也必将是其研究的起点。本书拟以“村庄”为主要视角,但视野又放眼于“城镇”,采用“村庄—市镇—城市”多元化的分析框架,针对村庄中相对内聚封闭,又与城乡、国内外市场体系互动同时存在,二者既相互冲突、又共生共荣的现象进行讨论,进而探讨中国基层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

从宏观上讲,研究状况:

(一) 国外:

日本学界:研究比较全面,农民社会生活,农村的政治控制,农业的经济发展等都有研究。我们要辩证的吸取这些研究材料。代表作:满洲史研究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同刊行会,1964~1965年);石田興平:《满洲における植民地経済の史的展開》(ミネルヴァ书房,1964年)西村成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法律文化社,1984年);荒武达朗:《近代满洲の開発と移民:渤海を渡った人びと》(汲古书院,2008年);冢濑进:《中国近代东北经济史研究》(东方书店,1993年);山本进:《环渤海交易圈の形成と変容:清末民国期华北东北の市場構造》(东方书店,2009年)永井里沙:《民国时期旧满洲农村运输体系的形成过程——张作霖统治期为中心》(中华农业文明



研究院 85 周年院庆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十一次学术年会会议论文, 2005 年) 等。

英美学界: 主要从东北政局和东北亚国际关系角度去研究中国东北。我们可以从外人的视角来看, 国际、国内“大气候”对东北乡村小环境的影响。代表作: A. J. Grajdanzev. Profit and Loss in Manchuria (Jun. , 1935); Owen Lattimore. Chinese Colonization in Manchuria (Apr. , 1932); John Stewart, Manchuria Today (1944); John R. Stewart. Chinese Migration to Manchuria 39 Setting New Records (Aug. , 1940); Ronald Suleski.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anchuria: Immigrant Laborers and Provincial Officials in the 1920s (Oct. , 1978); A. R. Crawford. Sketches of Missionary Life in Manchuria; Being Extracts from Letters Home of Rev. A. R. Crawford. Carswell, 1899; Alfred J. Costain. The Life of Dr. Arthur Jackson of Manchuria.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3; James Lee and Cameron Campbell,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 ~ 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Ramon H. Myers; Thomas R. Ulie. Foreign Influence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Liaotung Peninsula, 1906 ~ 1942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1, No. 2. (Feb. , 1972); VanderVen, Elizabeth: “Village – State Cooperation: Modern 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ir Funding, Haicheng County, Fengtian, 1905 ~ 1931”, Modern China, Vol. 31, No. 2; Issett, Christopher M. : “Village Regulation of Property and the Social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Manchuri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5, No. 1 2004; Ronald Suleski. 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 : tradition, modernization and Manchuria. New York : P. Lang, c2002; Shan, Patrick Fulia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Manchuria frontier, 1900 ~ 1931. Thesis (Ph. D.)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2003 等。总计约 200 多篇 (本)。英美学者研究往往是在宏观环境下来考察东北地区居民社会生活实态, 能进行与中国、日本、苏联等国家进行相关性对比, 而且在方法论上能引进数量经济学进行分析现象, 得出结论。但不足之处, 缺少更为细致的实证研究, 有时候结论不免浮于表面, 缺少史料依托。

俄国学界: 一是研究东北北部 (即“北满”) 的农业; 二是主要研究中俄边界问题。前者大多还没有译介, 后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论战时期基本译介过来, 从中我们业可以看到一些俄国和中国东北农民的生活状况, 比较他们



之间的经济差距。代表作：А. Болобан (А. 鲍洛邦) Земледелие и хлебо -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еверной Мань 北满垦务农业志；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Северной Маньчжурии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Северной Маньчжурии 北满农业；В. Толмачев (В. 托尔马切夫)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ие орудия 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и 满洲农民的耕作工具；Н. Г. Желвицкий (日尔维茨基) Манчжурцы (满洲)；А. Доморовский (А. 多莫罗夫斯基) МанчжурияВ, Комарова (В. 科马罗娃) Флора Маньчжурии 满州植物志；Д. Позднеев (Д. 波兹德涅耶夫) Описание Маньчжурии 描述满洲；А. Воейков (А. 沃耶依科夫) Климат Маньчжурии с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 从农业，工业生活及人的身体健康看满洲气候；Китайская колонизация Маньчжурии и е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Е. Е. Яшинов；О · В · 库丘克的《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头三十年北满地区的居民和经济开发情况》(莫斯科，1979 年)；М · А · 帕特鲁舍娃的《中国对满洲地区的开拓和清政府的政策 (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初)》(莫斯科，1982 年)；马克《黑龙江旅行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3 年) 等。

俄文研究著述善于运用自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调查，资料较为翔实、丰富，很注意中国东北与俄国远东地区进行各个方面的比较，但主要还是以“北满”为主，较少有对东北区域进行总体研究。

国内研究状况：总体上看，农业史研究较为显著，但还没有从社会史角度进行最直接、最系统地考察近代东北乡村社会情况的专著和文章。我们只能从总体上了解把握：

第一个阶段：(1931 ~ 1949 年) 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开发拓殖”、“移民”问题。金毓黻是这一阶段成就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著名东北史学者。其《辽东文献记略》，首次系统编辑了东北山川、城镇、人物、金石和典籍方面的史料。最主要的是他编辑大型东北史料集《辽海丛书》。至今，此书仍为研究东北史的必备之书。他的《东北通史》是我国第一部东北通史的专著。谢国桢的《清代流入开发东北史》、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景方昶的《东北輿地释略》、魏声和的《吉林地志》等都能从各个层面了解东北乡村的生存环境、边疆变迁、风俗人情等。此外这一时期掀起了新修地方志的热潮，其中辽宁省新属县市修志有 95 种，吉林省则多达 102 种，黑龙江省有 38 种，我们可从中考察一些民俗民情。

第二个阶段：(1949 ~ 1979 年) 这是东北乡村研究的低迷阶段，由于期间



“中苏交往”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色彩，出现了一些揭露旧社会地主压迫农民的“诉苦材料”和“反省材料”，大多散落政协“文史资料”里和各省市县档案馆里。另外中苏论战中又有很多研究，基本是定在“东北领域界定”、“外交”基调上，但仍有少量“民族调查”、“社会性质问题”论述出现。代表作品有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东北师范大学《沙俄侵华史简编》等中俄关系史书籍。

第三个阶段：（1979~2007年）研究范围较广。但农业史居多。

1. 东北农业经济方面：孔经纬的《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中国东北经济变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这一系列研究，更侧重于东北地区整体经济结构的演变和经济政策的变迁。乌廷玉等《东北土地关系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东北旗地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乌廷玉《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这一系列的研究，更为微观地透析了东北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1990年）、《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1660年~1945年》（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更为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了东北农业生产状况，农业技术改进等诸多方面。

2. 东北农村行政控制方面：刁书仁的“东北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如《论清代吉林地区行政体制及其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3期）、《论清朝对东北边疆各族的管理体制》（《史学集刊》2002年4期）。这些研究不仅反映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还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关系。

3. 东北移民的研究：国内此项研究从近代到当代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从近代的谢国桢、吴希庸的专著，到当代赵中孚、王杉、马平安、张士尊、高强、范立君等论文和著作，都从不同角度探究了东北移民历史的变迁，并将移民研究同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变迁相联系起来。

4. 其他方面，石方的《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是一部多视角、全方位地论述有清一代黑龙江区域的社会发展概况的佳作。杨晓军博士论文《区域视野中的乡村、学校与社会——清末民初东北乡村教育研究（1905~1931）》（吉林大学，2009年6月），于逢春《中国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统合之历程——以20世纪上半叶东北边疆民族国民教育为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都让我们从新视角来了解东北的教育历



史。另外这时期，东北三省整理刊印的《辽海丛书》、《长白丛书》、《黑水丛书》鼎足而立，成为整个东北地区地方文献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史方面：常城等《现代东北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王魁喜《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李治亭主编《中国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薛虹等《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孟东风《吉林近代史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等等。

综观近八十年近代东北社会研究状况，其大致呈现了以下特点：第一，研究面广，就研究范围而言，其涉及面广泛，国民经济各部门均有论述，而且对某个领域、部门的研究有总体探讨近代东北社会经济的演变，也有对某个细微问题作个案研究的，人口经济、城镇建设、民族经济、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多有涉及。第二，研究论题紧密与现实结合。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振兴东北”决策的提出，研究者多从实际出发，反观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尤其对近代东北经济的研究最为用力，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当然在研究中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研究的不平衡性。首先是研究领域上的不平衡，农业、移民研究有余，乡村基层、村民活动研究不足，几乎为空白，其次是研究时段的不平衡，清朝、伪满时段研究较多，而东北地区民国时段（1912～1931）研究上除农业外其他领域研究相当不足。甚至就是这样的研究时间段也是割裂的，没有前后延伸，形成一个长时段的研究，很难能看出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最主要的是在研究中还是以政治、经济史研究为主，很少见到社会史的研究，显得十分的僵硬，应该通过社会生活的研究，还“历史以血肉”^①（2）总体考察过多，比较研究不够，量化研究、个案研究缺乏，所见文章大多是叙述性文章，或述其经历，或论其原委，很少见到比较、量化、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多以传统为主，对于东北各省之间、东北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东北与朝鲜、日本、俄国之间，经济状况都存在着一一定的可比性，对此研究者甚少。（3）学科间的交叉兼容性不够，社会经济史的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既有史学的性质，又有社会学、经济学的某些属性，这就决定了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不只是理论说教与史料堆砌，更应该有经济理论的运用，这样一来，东北地区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① 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不会缺少理论支撑与深入分析。

总体上反映东北史的研究大部分还停留于政治史、经济史等的研究，还很少有“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作为东北人口主体的乡村居民的“社会生活”的研究，显得有些过于“抽象”，不够“具体”。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①

二、课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首先面临着确定时空范围的问题。本书论述的时间范围所定的“近代”东北，包括晚清（1840～1911）和民国时期（1912～1931年）的东北，鉴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处于日伪统治，完全打断了以往的东北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发展轨迹，所以不作为本书论述内容。由于时间上的连续性和事件的承继性，一些问题在表述上都要适当地向前追溯和向后延展。

研究区域的选择应该更多地考虑自然形成的具有一致性、关联性的区域，而不应囿于行政区划的界定范围，本书就是以近代东北地区所包括的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为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当时的行政区划上所特定，更是自然、人文等关联性、相近性等的需要，才纳入同一研究体，但在整个行文，更多着墨于传统意义上东三省的研究。同样，乡村社会主要从功能区划是分：山村、渔村、林村、农村，但本书主要以农村研究为主体，其他形式的村落兼顾的写法，这样一面东北经济的多元化的特点，更重要的还是突出农村、农业、农民的主位研究。这是本书所研究的关键点：

以乡村为视角来揭示东北的近代化历程：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商品化、思想的多元化、宗教的世俗化等等。

农村的政治控制



农民的社会生活——农业的经济发展

其关键问题在于剖析九十年来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的变迁。

三、资料收集与运用

本书所涉及的资料，可以说古今中外，“古”至清王朝正史、档案、上

^①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百科知识》，1986年第1期。



谕、起居注；“今”至当今“三农问题”、“振兴东北”研究理论；“外”涉日本满铁资料、亚细亚文库俄、欧美人士的笔记、游记和教会文献等等，并根据这些资料性质论文进行了有选择的使用，即“因材施教”。社会史的下层取向，使得其有关史料，在正史中，鲜见其踪迹，“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但这种新的史学范式，既然已经逸出了传统史学之外，其材料亦不会局促于正史之一隅。打破此层之旧域，社会史史料呈现出更深更广的特质。

第一类：清代、民国政府的文牍、报刊、论著。这是本书的主体资料。清朝时期的《清实录》、《清史稿》、《八旗通志》、《清文献通考》、《东华录》、《上谕档》、《起居注》等等，民国中央政府和东三省地方政府的公报、官报等，这些文牍具有很强“上层”意志，我们便于从宏观上去了解的掌握政府政治、经济、社会等大政方针，并且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的东北的“下层”乡村社会发展取向与趋向。而当时的报刊、论著有时往往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回应和实态。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本书也不排斥使用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如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等，这样扩大现实的“生活场景”，能更为丰富而鲜明地来证“实”。

第二类：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东北地方志书和私人撰写的地理志和游记。“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地方志的记载虽然也难免出现一些详略失当之处，却保存了不少鲜见于其它书籍的史料。谭其骧先生指出：“（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巨大的文献宝库。这些方志中包含着大量可贵的史料，给我们今天进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①据郝瑶甫《东北地方志考略》统计明代以来东北旧志至少260种，本人所阅读的地方志不下200多种，志书的内容较为丰富，一般包括“疆域”、“沿革”、“形胜”、“经政”、“实业”、“户口”、“人物”、“艺文”等专题，这极大丰富了近代东北乡村社会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史书和一般论著很少记载的东北乡村基层“草根社会”的民风、民俗、民情等。这些“微观”的东西，大多内容丰富、广泛，不啻是一部包罗万象、别具风格的小百科全书。

第三类：档案资料和调查资料、“文史资料”等。既有东三省档案馆藏资料，如旗务文件、行政官署文书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吉林行省档案等。又有今人整理的档案资料，如《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清代吉林档案

^① 谭其骧：《地方志史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



史料选编》、《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琿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等这一类资料主要从“史”上对第一类资料进行补充。本身各省所藏档案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针对性，由于这些特点，更有益于论题深入细致地研究。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凌纯声到东北进行赫哲族的调查，而这一次调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台湾学者李亦园认为这一次的调查行动“开创了中研院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传统”，而其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第一本“科学”的民族志，凌先生是中国“科学民族志”的开创者，而后的边疆民族之调查，无不以此书为范本。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全国出现了少数民族调查和东北农村调查的高潮。这些调查资料反映东北的民族生活历史演变、农业经济状况等，虽然主要反映解放前后的乡村变化，但其材料对农业生产习惯以及农民、地主等乡村居民的家史的追溯，也反映了 20 世纪 30 年代前东北乡村生活状况。如李尔重、富振声《东北地主富农研究》、东北局宣传部《东北农村调查》、《血腥发家史》等。当代学者李中清（James Lee）、Isett Christopher Mills、定宜庄、聂莉莉、阎云翔、刘正爱等在其研究中深入东北乡村进行了田野调查，也是本书的重要参照。本人以“历史资料”为据，以“民间调查”为证，并在讨论、考证的基础上对整个研究问题将进行长期的修订，

“三亲性”是政协文史资料的一个重要特色，撰稿人提供的资料必须是亲历、亲见、亲闻的东西，而不是文献史料的翻版或组合。其中许多当事人对过往历史的回忆，往往是别人难以知道的背景和细节，有的资料甚至是某一领域的有代表性的珍品，具备了还历史本来面貌，补充历史文献不足，匡正历史文献谬误的特性。由于解放后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文史资料也有很多回忆存在不实之处，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第四类：外文资料。在研究中，不能单靠中国自身来“理解”和“诠释”自己，还要放在国际视野下来认识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作为特殊的地域，不仅有本国关内人民“闯关东”的影像，也有着西方考察家、传教士的游历的足迹，有着朝鲜使者和移民匆匆的步履，更有着日、俄侵袭的硝烟，东西方文明在这里得以充分交汇，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军事上等诸多方面相互碰撞、交流、学习。本书有选择性和批判性选用一些异域人士留下的资料，“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不仅能够给我们提供新资料，而且可以给我们反观中国提供新视角，通过“他者”来



认识“自我”，形成了“会通”研究。本书主要采用以个人游记、笔记和教会文献为主的欧美资料、以“亚细亚文库”为主的俄文文献、以满铁调查报告为主的日本文献、以“燕行录”为主的朝鲜文献等。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利用，尤其对满铁对中国东北农村调查日档案资料和中东铁路局对中国东北的调查资料的整理与利用，进一步补充近代东北地区研究文献上不足，或考证、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在大时空背景下比较中外的农业经济差异和揭示近代中国东北的社会生活变迁。

事实上，大时空坐标下多视角下进行跨学科、跨地域的国际化合作研究，是近年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也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事情。本人今后将在“东西方视域下的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文献研究”（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09YJC770023）这一课题基础作以深入而细致的后续研究。

第五类：谱牒、碑拓资料。由于东北开发较晚，土著少数民族大多无文字历史，移民人口族谱大多散落在原籍，我们还是从有关部门获得了部分家谱，如《吉林永吉徐氏宗谱》（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本），《吉林永吉马氏谱书》（吉林省吉林市图书馆馆藏），《马佳氏族谱》（吉林大学图书馆藏）等。同时也参照了一些“三史”、村民控诉史、地主反省材料等。同时我们还尽可能地引用一些碑拓资料，目的在于“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综合这些材料，我们能进一步了解、追溯乡村居民家庭结构、迁移、社会生活、经济状况等更为细致的生产、生活状态。

第六类、前人与今人的学术成果，前人由于所处年代与近代历史较近，其材料带有追述性色彩，可以权作认为是“口述史”，补充和佐证了近代东北乡村资料上的缺欠。还有《文史资料》、“土地改革”与文革档案中的“成份调查”，都追述了村民的二三十年代的个人家庭生活与经济状况。可以说，今人的学术成果，我们主要从观点上吸收他们可取之处，辩证和发展地看待近代东北三农问题。

为了拓宽研究视野，提高理论水平，本人又参阅相关学科论著，如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史料”之纬



与“观念”之经编织，编出近代东北乡村社会的锦绣。这些学科、理论间之间的交叉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论文的理论与研究视野。

以社区结构的视角来看，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和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农业是乡村产业的主体，乡村主要是农业居民的聚居地，但乡村又不仅仅是农业，还包含了士、农、工、商各业与各阶层的集合体，也是聚集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民族性、地域性极强的生活共同体。尤其东北地区还广泛存在着渔业、林业、牧业为主的特色乡村经济类型，这是中国其他地域很难具有的。因而，对于乡村史的研究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方法。^①本书采用的计量史学和田野调查也正是基于这种需要。

英国经济史家希克斯就认为，“学术上的专门化符合‘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某种情况，但生活中发生过的情況不是全部如此……在我看来，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②这样一种对话，就应当打破狭隘的学科意识形成的樊篱，真正以开放的问题意识来进行科研的平等交流。

近代以来，城、乡二元化的进一步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都客观的使人们进一步关注乡村“日常生活”与“下层民众”，引起学界的“学术关怀”，进一步深化乡村社会的研究及探寻解决的途径。此外，在理论与方法上，作为社会史领域的乡村史，当代社会史研究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学的理论、范畴、方法，特别是当代社会结构理论、社区环境、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分化界线的理论与方法，都应该与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整合，构成 20 世纪中国乡村史研究的基本方法。^③

随着中国区域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化，20 世纪的中国东北地区乡村史研究必将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富有发展前景的新领域。

① 王先明：《开展二十世纪的中国乡村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 年 12 月 1 日。

②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 年，第 4～5 页。

③ 王先明：《开展二十世纪的中国乡村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 年 12 月 1 日。